

記憶史拓展孫中山研究空間

羅福惠

近幾年來，記憶史研究方興未艾，尤其是在 2011 年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際，有關辛亥革命與孫中山的紀念與記憶史研究成果迭出。轉瞬又是孫中山 150 周年誕辰，為促進孫中山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和發展，有必要對近年來孫中山記憶史研究的基本情況加以回顧，以便研究者全面瞭解中國史學界的已有成果，避免造成某種程度上學術研究的重複。

一、記憶史研究的興起

西方學界對“記憶”問題的關注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人們造成的痛苦，當時涉及記憶問題的多為文學家、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於 1925 年出版的《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一書引入“集體記憶”概念，歷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Léopold Benjamin Bloch）為此書撰有評論，但“記憶”並未能就此引起史學界的足夠重視。直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著法國社會的變遷與歷史學本身的重大轉向，集體記憶才成為歷史學研究的新對象，法國記憶史逐漸萌發，其後傳播到德、美等國家，八十年代在歐美史學界全面繁盛。隨著新社會文化史研究趨於成熟，社會記憶成為新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領域之一。英國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將新社會文化史分為七大類，其中即包括社會記憶史研究。^①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為法國著名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發起組織編寫的《記憶場所》（*Les Lieux de Mémoire*），該書成為“集體記憶史研究成果的大檢閱”。^②《記憶場所》推動記憶史研究的全面發展，在記憶史理論的形成、方法的運用、史料的選取等方面都具有開創性的指導作用，用一直關注西方記憶史的學者沈堅的話說：《記憶場所》與“記憶史共同成長的學術歷程、它的理論特色、它所代表的研究範式都值得我們近距離觀察”。^③可以說，二戰後西方史學的發展，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現了“語言學的轉向”，到八十年代則出現了“記憶的轉向”。

中國大陸學界的記憶史研究相對晚起。1996 年，沈衛威在論述胡適受“五四”影響時，運用“歷史記憶”概念，較早將“記憶”引入歷史人物研究中。^④1997 年，李放春、李猛簡介西方與台灣學界最新的記憶史研究成果，特別提及王明珂，其著眼點在於通過“集體記憶與社會認同”認識“口述史和傳記在社會與歷史研究中的運用”。^⑤羅志田通過分析羅爾綱關於胡適生平事蹟回憶中對“胡適形象”的修訂和重塑，認為“回憶也可是詮釋”，而且“歷史記憶”“可以不斷地添寫、修改、擦拭”，有意無意之間反距“歷史真相”更遠。^⑥楊念群在評介景軍英文記憶史實證研究著作《神堂記憶》（*The Temple of Memories*）時，著重介紹了他對“歷史記憶”的一些概念的理解。^⑦這些構成了一批中國大陸學者最早介紹、學習和實踐記憶史研究的起始。

二、孫中山記憶史研究

隨著新文化史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傳入中國，記憶史研究逐漸興起，研究孫中山記憶史的相關著述開始出現。陳蘊茜顯然是最先嘗試者，她先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闡述孫中山崇拜的相關問題，比如《時間、儀式維度中的“總理紀念週”》、《空間重組與孫中山崇拜——以民國時期中山公園為中心的考察》、《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徵符號的建構》、《植樹節與孫中山崇拜》、《“總理遺像”與孫中山崇拜》、《國家典禮、民間儀式與社會記憶——全國奉安紀念與孫中山符號的建構》。^⑨後來形成《崇拜與記憶——孫中山符號的建構與傳播》一書，通過考察分析紀念活動、慶典儀式和有關空間設施，從一個全新的角度論述孫中山形象的建構。同一時期還有段春暉對民國時期孫中山社會記憶生產路徑的解析，指出國民黨非常重視強化社會記憶中孫中山的政治價值和實踐功用，不斷通過規訓化的儀式、獨白式的話語和操縱性的政治動員等手段對孫中山社會記憶進行重構。^⑩

2011年是孫中山記憶史研究極其興盛的一年。該年筆者提出“辛亥革命記憶”的概念，並進行了有關理論的闡述，認為研究“辛亥革命記憶史”與對辛亥革命事件本身的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其中關於孫中山的記憶也是相當重要的部分。^⑪並且主持了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委託項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項目團隊以階段性成果的形式先後發表30多篇論文，最終成果是四卷本220萬字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其中將近一半的篇幅是敘述和分析孫中山逝世之後，中國歷屆政府、政治社團、工商界、宗教界、文教界及海外華人華僑界對孫中山的業績和思想的紀念和記憶。^⑫

有的研究者把“記憶”特指為“紀念”，因為紀念活動本身就是傳遞和傳播歷史記憶的方式之一，所以各個時期的孫中山紀念活動亦是表達人們的孫中山記憶。羅國輝、邵雍研究了抗戰時期的孫中山紀念活動，認為此舉不僅是人們回顧、緬懷、研究和學習教育的重要方式，而且有力地推動了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亦有助於贏得國際支持，營造有利於中國抗戰的國際環境。^⑬鍾聲、高翔宇以《申報》為中心，考察了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通過對孫中山誕辰紀念、孫中山逝世紀念等紀念儀式的舉行，強化了民眾的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對國民黨和民國政府的認同，從而凸顯了“抗戰建國”的時代主題，成為國民政府進行抗戰動員的一種有效形式。^⑭靳燕凌則指出，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開展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中，紀念主題有一個從“三民主義”、“統一戰線”到“成立聯合政府”的變化，^⑮但貫穿一致地表達了對孫中山先生的緬懷與崇敬，也通過紀念活動證明自己是孫中山事業的繼承者。^⑯

張海鵬最先把孫中山紀念活動的研究延伸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他的《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的紀念與評價》系統考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0年來黨和國家每十年一次的紀念活動，由此出發對孫中山進行了崇高的評價，認為孫中山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是為祖國的獨立和自由而奮鬥終身的戰士。中國共產黨始終把自己看成是孫中山事業的支持者、合作者、繼承者、發揚者，把中國大陸所取得的成就看成是孫中山所開創的民族復興大業所結出的碩果。^⑰王連生則以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共領導人對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歷史地位所作的評價為依據，為各個時期此類紀念活動的必要性作了論證。尤其認為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活動的規格之高、影響之大，可以與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和毛澤東誕辰相比擬。中國共產黨建構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歷史記

憶，其目的是整合中華民族的各種力量，發揚中華民族的全部智慧，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①

三、從“歷史記憶”中提煉昇華

如同一般的記憶史研究一樣，近年孫中山記憶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視的成果，但相較主流方式和習慣方法的研究，這一新領域新方法的研究，還有待探索和深化。

這裡所說的主流方式和習慣方法，就是史學工作者通過原有史料對孫中山其人其事及思想和精神加以研究，研究工作可說是研究者和孫中山這樣的歷史人物兩者之間的互動。而記憶史研究則是史學工作者在已掌握原有史料，瞭解孫中山其人其事及思想和精神的基礎上，對孫中山逝世後出現的各種“歷史記憶”的資料進行瞭解和研究。如果說“歷史記憶”體現的是記憶者（包括個體、群體和集體）和孫中山兩者之間的相互關係，這裡所說的記憶史研究則是研究者、記憶者和孫中山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記憶者的身份和他們留下的資料是多樣化的。幾代個人，有的是孫中山的戰友、同事甚至政治對手，有的則是這些人的後裔，有的記憶具有直接性，有的則只有間接性。民國時期以來的歷屆政府，曾活躍在政治舞臺上的各種黨派、社團，其意識形態信仰和形象認同既有差異，更有變化。這些“歷史記憶”或者通過各種個體的日記、筆札、回憶錄、自傳、口述歷史來流傳，或者以眾多政府政黨領導人的講話、官方文件來宣示，或者見於報導有關孫中山紀念活動的各個時期的各種報刊。因而可以說，除了立場和利害關係以外，“歷史記憶”在很大程度上包含著時代、政局、思潮等客觀因素和記憶者的主觀因素，它是記憶者的感知、閱讀加上想像而形成的對孫中山的認識，是在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情感和理性的交織中產生的選擇性建構。

一切歷史人物，都要經受歷史的沖刷、淬煉和檢驗，然後才成就其崇高偉大或者卑微渺小，而“歷史記憶”既是其間的檢驗過程和方法之一，也影響到每段檢驗過程的結果。因此，孫中山研究者如果能夠關注並參與發掘前述“歷史記憶”的眾多方面的史料，無論是對個體記憶或是群體、集體記憶都下一番研究功夫，首先看記憶者說了些什麼，並辨別其中的真實或虛妄，進而分析記憶者為什麼如此說，就不僅能從一個方面加深對記憶者的認知，加強對記憶者所處時代和環境的理解，更有助於孫中山研究的拓展，既豐富孫中山在生言動、業績、思想的探討，並且延伸到孫中山身後的影響和作用的研究。

①彼得·伯克：《西方新社會文化史》，劉華譯、李宏圖校，上海：《歷史教學問題》，2000年第4期。

②參見沈堅：《法國史學的新發展》，北京：《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3期。該書中譯本參見皮埃爾·諾拉主編：《記憶之場：法國國民意識的文化社會史》，黃豔紅等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③沈堅：《記憶與歷史的博弈：法國記憶史的建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10年第3期。

④沈衛威：《五四留給胡適的歷史記憶》，安徽黃山：《徽州社會科學》，1996年第1期。

⑤李放春、李猛：《集體記憶與社會認同——口述史和傳記在社會與歷史研究中的運用》，北京：《國外社會學》，1997年第4～5期。論及王明珂的文章是《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台北：《思與言》，1996年第3期。

⑥羅厚立：《回憶也可是詮釋：歷史記憶與歷史真相》，廣州：《開放時代》，1997年第5期。

- ⑦楊念群：《歷史記憶之鑑》，北京：《讀書》，1997年第11期。
- ⑧陳蘊茜：《時間、儀式維度中的“總理紀念週”》，廣州：《開放時代》，2005年第4期；《空間重組與孫中山崇拜——以民國時期中山公園為中心的考察》，上海：《史林》，2006年第1期；《合法性與“孫中山”政治象徵符號的建構》，南京：《江海學刊》，2006年第2期；《植樹節與孫中山崇拜》，南京：《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總理遺像”與孫中山崇拜》，南京：《江蘇社會科學》，2006年第6期；《國家典禮、民間儀式與社會記憶——全國奉安紀念與孫中山符號的建構》，南京：《南京社會科學》，2009年第8期。
- ⑨段春暉：《民國時期孫中山社會記憶的生產路徑分析》，黑龍江齊齊哈爾：《理論觀察》，2007年第5期。
- ⑩羅福惠：《研究“辛亥革命記憶”的意義與方法》，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 ⑪羅福惠、朱英主編：《辛亥革命的百年記憶與詮釋》，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 ⑫羅國輝、邵雍：《略論抗日戰爭時期的孫中山紀念活動》，廣州：《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3期。
- ⑬鍾聲、高翔宇：《全面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孫中山紀念與儀式政治——以〈申報〉為中心的考察（1937.7~1938.11）》，福建三明：《三明學院學報》，2011年第4期。
- ⑭靳燕凌：《延安時期中共對孫中山及辛亥革命紀念的主題研究》，長沙：《湘潮》（下半月），2015年第8期。
- ⑮靳燕凌：《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對孫中山的紀念與評價》，長沙：《湘潮》（下半月），2015年第2期。
- ⑯張海鵬：《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對孫中山的紀念與評價》，北京：《黨的文獻》，2001年第5期。
- ⑰王連生：《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建構紀念辛亥革命和孫中山的歷史記憶》，河南南陽：《南都學壇》（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1年第6期。

（作者係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